

东方社会 的思想与历程

从
马克思
到
邓小平

戴世平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此书受云南省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方社会的思想与历程：从马克思到邓小平/戴世平
编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ISBN 7-222-02971-0

I. 东... II. 戴... III. 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
设模式-研究②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
③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 IV. A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3274 号

责任编辑：欧阳常贵

封面设计：王玉辉

东方社会的思想与历程 ——从马克思到邓小平

戴世平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邮编：650011

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5 字数：240 000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100

ISBN 7-222-02971-0/C·43

定价：16.00 元

目 录

导 言	东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从马克思到邓小平	(1)
第一章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提出	(10)
	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变化	(10)
	二、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	(23)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课题	(32)
第二章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 基本内容	(38)
	一、唯物史观与东方社会理论	(38)
	二、东方社会理论的逻辑依据：亚细亚 生产方式	(47)
	三、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依据：古代社会	(59)
	四、东方社会的经济结构	(66)
	五、东方社会的政治结构	(77)

第三章 东方社会与恩格斯史前社会理论	(95)
一、恩格斯史前社会分期的方法论原则	(96)
二、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	(103)
三、恩格斯关于私有制、阶级和国家起源的思想	(110)
四、东方社会和史前社会的比较	(123)
第四章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方法论思想	(134)
一、经济学与人类学的方法	(134)
二、“人体”解剖与“猴体”解剖的方法	(141)
三、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	(149)
第五章 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	(158)
一、世界历史条件下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	(158)
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和现实条件	(170)
三、跨越“卡夫丁峡谷”与俄国道路	(181)
第六章 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的探索	(194)
一、列宁关于“一国胜利”的理论	(194)
二、列宁对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认识	(204)
三、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	(211)

- 四、列宁晚年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再思考 (223)

第七章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实践与传统模式 (243)

- 一、斯大林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和新经济政策 (244)
- 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的方针 (251)
- 三、苏联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与传统模式 (263)

第八章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271)

- 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曲折历程 (271)
- 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 (284)
- 三、正确认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290)

第九章 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 (310)

- 一、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311)
- 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323)
- 三、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和理论体系 (335)
- 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344)

结束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351)

后 记 (357)

导 言

东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从马克思到邓小平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是一尊不朽的历史丰碑。这本书以严密的逻辑和翔实的史料令人信服地证明，由于有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社会主义才摆脱了假说形态，真正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作为无产阶级运动之理论表现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是从那里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所以，恩格斯在论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及其基本原理时，无不以欧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为背景，他所表述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和特征也以这些国家为原型。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的原理，论证了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是仔细辨识也可以发现，无论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还是过渡时期必须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用无产阶级专政来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等等，所有这些都必须以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

和资产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离开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科学社会主义就是无的放矢。

而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恰恰就缺少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在广大的东方世界，不仅经济落后，生产的商品化和社会化的程度很低，而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本身也很幼稚和孱弱，远未成为能够问鼎统治权力的强大的社会力量。这种与西欧完全不同的特殊国情，已经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的背景和初衷，它没有回答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马克思来说，接触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经历了长期的过程，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才在认识上有较大的突破。

19世纪40年代，当马克思主义刚刚诞生的时候，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概念还不甚明晰。从19世纪50年代起，伴随着世界的殖民化进程，东方落后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的材料大量地涌现出来。出于对落后国家人民命运的关心，马克思以极大的热情研读了这些材料，逐步了解到东方社会的现实状况和历史发展特点。在马克思看来，把握东方社会独有的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和专制国家三位一体的奇妙结合，对解开东方社会之谜并预示其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正式称它为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思想的深邃和机敏表现在，他不仅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表征东方社会的现实特点，而且鉴于其村社和公有制的存在，又将它设想为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活化石，认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次生形态就是由这种亚细亚生产方式衍生出来的。

但是面对未来，马克思仍然认为，资本主义是经济文化

落后国家唯一可能的现实前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历史取向，但只有资本主义创造的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才能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企图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那只能是一种空想。就历史发展行程来说，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已被西方拉下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它们眼前面临的任務不是如何实践社会主义，而是如何经过资本主义形态去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考虑未来的社会主义前景，这是马克思在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基本观点。

但是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末期，马克思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飞跃，这特别体现在他对俄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构想中。与西欧相比，俄国是一个庞大而又落后的东方帝国，也是世界上唯一较为完整地保留了村社及土地公有制的国家。1861 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与预期相反，不但没有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反而使各种社会冲突都空前地激化起来。1877 年 4 月爆发的俄土战争进一步加剧了革命危机，沙皇政府内外交困，风雨飘摇，随时都可能被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所倾覆。在这种形势下，一个尖锐的问题提到马克思面前：如果俄国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那么人民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将向何处去？是按照五六十年代的设想，走资本主义的老路，还是另辟蹊径，探索一条更为光明的现实之路？正是在对这个问题的深沉思索中，马克思第一次突破了主要以西方国家为背景的科学社会主义构想图式，触及了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尝试给予科学的解答。马克思揭示了这样一个社会发展规律：像俄国这样的具有农村公社的亚细亚生

产方式传统的落后国家，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条件下，可以利用历史提供的“最好的机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

对于这种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马克思没有作出详尽的论述。但有一点必须肯定，他是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尖锐化而导致的社会主义与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严格区别开来的。他特别指出，后者“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其“一切肯定的成就”。这就是说，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而后者则是有待“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有待“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部分得以证实。

列宁对于这种“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最伟大的举动就是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试图建立一种能容纳多种经济成份，容纳商品货币关系的新的经济体制。但一方面由于没有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另一方面由于过早地逝世，列宁并没有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内涵、任务，与“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之关系作出详尽的论述。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急于变革生产关系，就是想建立起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他把

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解释成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占有的矛盾尖锐化的产物。这样，顺理成章，他也就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建立的有待“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尖锐化而导致的建立在“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混为一谈，按照后者的模式来规划前者。他之所以在所有制方面追求“纯而又纯”，之所以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集中统一计划指导下的产品经济，均源于此。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主要是给中国送来了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走向社会主义的光辉范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对为什么中国有必要和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作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论证。同十月革命一样，中国革命的成功也部分地证明了马克思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但非常可惜，毛泽东后来犯了与斯大林类似的错误。中国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明明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建立起来的有待“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的社会主义，而他即把此误认为是那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而导致的建立在“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这样，毛泽东就基本上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描述的那种社会主义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挫折。

真正把两种社会主义明确区别开来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

设计师邓小平。他之所以强调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就是为了把它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中所描述的那种社会主义区别开来。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要旨就是按照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自身的要求，而不是按照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而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在晚年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列宁、毛泽东只是将此设想实施了一半，即只是分别在苏联和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而此设想的另一半，或许是更重要的另一半，即将两种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按照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自身的要求来指导其建设，进而最后走向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描述的那种社会主义，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邓小平得以实现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据和意义就在这里。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从区分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出发，正确地确定了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方位。我国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所说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尽管它称作是社会主义，但就其担负的经济任务来看，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同的，其归宿都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描述的那种社会主义，即理论界通常所说的“经典社会主义”。

按照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而形成的社会主义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后者是“资本主

义后”的社会主义，前者有待“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后者则建立在“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的基础之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无论就其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的论述，还是就其对社会主义的外部条件、战略步骤、领导力量、依靠力量的阐发，都是围绕着如何“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这一基点展开的。我们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就是要改变与“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不相适应的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的、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同这种体制相关联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建立起与“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能有效地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我们为什么要实行对外开放？为什么邓小平要把对外开放当作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国策？就是为了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经验和技术，将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就为我所用。纵观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实行改革开放的必要性与必然性的论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依据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即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要获得发展，必须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这一内在要求。

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论述社会主义时，确实把市场经济排斥在社会主义之外，甚至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在他看来，市场经济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格格不入，因此他主张，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市场经济就将被消除。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充足的理由来证明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是“错误的空想”。倘若我

们的社会主义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论述的那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而形成的“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那么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而排斥市场经济也许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也不会因为排斥市场经济而遭到严重挫折。但我们的社会主义恰恰不是这样的社会主义，而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我们非但不能排斥而且还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邓小平对于市场经济的科学分析，是建立在对两种社会主义严格区别，对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的正确界定基础之上的，因此具有极强的理论说服力。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原来常被人视为“说不清楚”的问题，只要放到邓小平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中，进而放到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构想中进行观察，就马上变得一清二楚。

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客观存在的。这种联系一方面说明了马克思的伟大，人们信服地认识到，马克思的设想虽然已有一百多年了，但至今愈发证明它之正确，倘若违反必将失败；另一方面说明了邓小平的高明，人们同样信服地认识到，在世界社会主义遇到空前挫折、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经受了严重考验的今天，唯有邓小平全面、正确地发扬光大了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并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拯救了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及其巨大威力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生命活力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辛勤探索和勇于创新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昭示我们，要站在

时代的新起跑线上，放眼世界，面向未来，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更要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形态。如江泽民所指出的：“只要我们按照这个理论所指引的方向、道路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干下去，一直干到下个世纪的中叶，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就一定能够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第一章

马克思东方社会 理论的提出

19 世纪 70 年代，马克思的思想历程随着世界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他放下了他曾经为之呕心沥血的经济学研究，开始钻研那些似乎和经济学研究没有什么特殊重大直接联系的人类学著作，他不仅研究原始社会，而且把整个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都作为自己的考察对象；他不仅研究欧洲和美洲，更多的是研究俄国、印度、爪哇这样一些东方民族或地区的历史，把主要精力放在东方社会和古代社会的研究。人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原因促使马克思晚年开始了这个不可思议的研究兴趣的转移？这与他终生所抱定的革命理想又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变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9 世纪 40 年代为无产阶级创立科学

世界观时，就明确地宣布：“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① 这一科学预言对于无产阶级在 19 世纪上半叶从事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1848 年欧洲革命期间，无产阶级在和资产阶级第一次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时，普遍相信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必将导致一场社会革命，革命的结果自然是资本主义的灭亡。马克思对此也深信不疑。在他看来，资产阶级革命一旦完成后，无产阶级可以立即掀起一场旨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风暴。为此，他在 1848 年欧洲革命期间，在指导思想上、组织上、策略上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作了充分的准备。他和恩格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指出：“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②。然而，革命并未不间断地延续下去，而是停顿了；资本主义也没有在这场革命中毁灭，反而通过革命为自己开辟了广阔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6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85 页。

发展道路。这种结局使马克思意识到社会变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灭亡主要将取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深刻矛盾。根据这个认识，马克思修正了他先前提出的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看法。他在总结 1848 年欧洲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强调，在资本主义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①。这个科学论断表明马克思并没有像那些激进的社会主义派别那样陷于革命的空想中，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为他提供了分析历史事变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

资本主义在 1848 年欧洲革命后所取得的长足进展，使马克思及时修正了他的革命理论，但他的革命热情丝毫没有减退，因为他深信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会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这些生产关系也必然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届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会敲响。然而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判别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呢？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集中表现；也就是说，经济危机是革命的前兆。“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②。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8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88 页。